

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经济学分析

汪燕敏,陈年红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蚌埠 233041)

摘要:皖北地区经历了辉煌而发达的远古和中古时期,但在近千年的自然灾害冲击下,产业发展滞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反过来,皖北的贫困文化又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在新时期要发展皖北,必须要改造当地的贫困文化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关键词:贫困;贫困文化;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3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1-0070-06

一、引言

由于淮河、长江两大江河的自然走向,安徽自北向南被分割成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不同地带,并且在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明显区别。其中皖北地区跨淮河两岸,包括 6 个地级市:阜阳、淮北、亳州、宿州、蚌埠、淮南。2005 年末该地区人口绝对量达 2690 万人,占全省总数的 44%,然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才 1686 亿元、财政收入 63.7 亿元、工业总产值 1059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84 亿元,分别仅相当于全省的 31%、9.7%、23.2%和 33%。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在全省的份额与其人口所占比例偏差达 11—34 个百分点之多,由此导致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更低。大体来说,该地区除人均农业总产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6.6% 外,其他人均经济指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以上,而恰恰这个指标反映的是经济落后的表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经到了在短期内难以磨平的程度。据测算,皖北地区如果要在“十一五”内赶上全省平均水平,GDP 的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 16%,即使要保持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现有差距而

不至于被扩大,经济增长速度也必须在 11% 以上。

皖北地区有着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煤炭资源丰富,是全省及华东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交通便利,该地区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铁路 237 公里,是全省平均密度的 15 倍,并处于大京九、京沪、欧亚大陆桥等重要线路上。另外皖北地区劳动力丰富而价格又比较低,农产品种类多、产量大,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以及烟叶、中药材生产基地。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全省宏观角度还是从当地来说,皖北地区经济都需要和应该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对于皖北经济目前的低迷状态,很多人归咎于历史原因。吴海涛在其博士论文中归纳了皖北衰落的 4 大原因:自然灾害频发、水利失修、战争和人口外迁。^[1]诚然,这些都是历史上皖北衰落的原因。但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战争的根源;淮河水利委员会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近半个世纪以来淮河沿岸自然灾害也很少发生;户籍制度的实行使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变得不可能,在这种背景下,皖北的经济依旧低迷。200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164 元)在全国倒数第二,仅高于贵州(200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52 元),低于甘肃、青海、新疆、

收稿日期:2007-08-2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当代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经济学研究”(2006jqw058)

作者简介:汪燕敏(1980-),浙江省衢州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统计、收入分配;

陈年红(1962-),湖北省武汉人,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统计、收入分配。

西藏等地区。这就说明,仅仅从物质层面来考察皖北地区的经济落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综合考虑皖北的经济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

二、皖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变迁

就一般情况而言,人文盛衰,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但人文盛衰,换句话说人的素质的高低,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皖北之所以落后,人的整体素质较差就是重要原因,但皖北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么落后的。皖北经历了发达而又辉煌的远古和中古时期、衰败而又贫穷的近古及近代时期,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变迁之路。

在远古时代,皖北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尤其适宜于人类的农耕活动。《尚书》中说:“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种种”,^[2]除雍州以外,淮北地区是九州中最肥沃的地区。至两汉时期,皖北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唐以前,这里是国家的重心地区,“江淮熟,天下足”一语道出了这个地区在中国政治与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绝非两淮人自夸,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金元时代,皖北农业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并没有达到北宋时期的水平。明清时期两淮社会经济有些方面已达新的高度。但就总体而言,皖北在全国范围内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地位,逐渐落后于江浙等地。

建国后,皖北仍是欠发达地区,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的“谷地”。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江浙地区、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来说,皖北,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从文化上看,皖北地区的文化从先秦的清静无为转为秦汉的奋发有为又变为南宋以来的贫困文化。老庄学说主张清静无为,其哲学基础“天人合一”理论缺乏现实性,实质上是消极避世。《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文景之世,兼容并包,融合百家,其主题表现为从清静无为到积极有为的转化。三国曹氏倡导“通达”,不拘礼法,崇尚务实。在这期间,皖北地区人才辈出,皖北文化是皖文化绝对的主流。东晋王朝建立,长江沿线地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两淮地区由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长期交战,其皖文化的重心地位开始丧失。隋唐北宋大一统时期,两淮的经济、文化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已

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从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来看,这时皖北的文化影响力已式微。^[3]黄河夺淮入海以后,皖北地区成为“洪水走廊”,这种状况持续了700多年,皖北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灾民意识抬头,逐渐形成皖北地区特有的贫困文化。

三、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特征

“贫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最早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刘易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于贫民窟、犹太人居住区、违章住户聚居地等贫困环境中的人具有相类似的家族结构、人际关系和超越国界的价值观体系。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拥有的亚文化,即贫困文化有关。在贫困文化中长大的人既具有绝望、依赖和自卑感,又对人生抱着宿命论式的消极态度。概而言之,贫困文化是处于贫困环境中的穷人所具有的特有文化体系,是直接根源于经济贫困的文化。

皖北贫困文化根源于皖北的灾民意识,这是它区别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文化的显著特点。所谓灾民意识,就是灾害发生后灾区人民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它是受害者基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在灾害打击之下毁坏、损伤和紊乱状态在灾民心理上的反映,并对灾民的行为发生支配作用。就某些自然灾害而言,如地震,不会引起人的意识整体的历史性变迁,从而也不会造成社会生存方式的根本变化,因为地震并不是一种频繁发生的灾害。而对频繁发生灾害的地区而言,意识的整体性的变迁是完全可能的。黄河夺淮以后,皖北整个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灾害频发的“洪水走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思想观念的客观基础。

1. 落后的人生观

自然灾害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许多村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一种无为哲学,听天由命,安贫守贱。思想保守,小富即安,缺乏竞争意识,求稳心理强烈,缺乏进取和竞争意识。市场经济观念淡薄,不能轻易尝试非农经营。惧怕变革,对国家政策、经济态势适应性差。这种无为主义的人生观,使他们安贫认命,不思进取,失去了

任何可以改变贫困的精神动力。

皖北地区落后的人生观还表现在无法摆脱对随时而来的灾害的恐惧。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四笔》卷九中说过：“凤阳民俗，每秋获既毕，相与挈家渡江，男女不分，鬻歌乞食，名曰“逃荒”；丰年亦复如是。风俗颓废，醜不知羞”。^[485]灾年逃荒，丰年也逃荒，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乞丐文化”。^[5103]

社会的现代化，关键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应当具有如下特征：对自己充满自信；强烈的时间观念；对人对事理性的态度；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对新鲜事物取积极态度；乐观的生活态度等。皖北人消极的人生观已经落伍于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2. 自私自利的心理

灾荒与人们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灾荒期间，“自私自利心愈重者，生存机会愈大，多经一次荒年，人口上，自私自利心理，即深刻一份”。^[6368]灾害到来，往往会导致社会关系的解体，产生否定自身生命和他人生命的变态心理。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期间都有大量的家庭内的自杀和他杀现象。灾害中心理变态的极端就是“人相食”。见诸与史料的“人相食”记载仅明朝就有6次。“人相食”现象的出现，对于个人精神和群体人际关系的损害都是永久性的。

现代社会生产高度现代化，分工也日益精细，这就要求人们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任务。自私自利的心理与现代化生产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3. 法制观念淡薄

作为经济领域中的行动者，“经济人”的理性行为是要受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固有的文化价值的影响，他们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受到以文化价值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的支配的，在“经济人”对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中，文化的诸方面始终在发挥作用。“经济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受到潜在的心理因素、传统习俗、文化价值观等的影响。因此他的理性选择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

皖北民风强悍，在封建社会经常有农民揭竿而起与政府对抗，如晚清的捻军。但皖北人普遍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很容易被一些不良亚文化所左右。犯罪是不良亚文化的产物。目前皖北面临严峻的毒品违法犯罪现状。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临泉。“安徽禁毒看临泉”，临泉毒品犯罪现象

日益猖獗，已成为公安部通报的全国六大毒品集散地之一。自1999年被国家禁毒委、公安部正式列入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以来，临泉禁毒成为了我国禁毒工作的“晴雨表”。

为了避免或遏制贩毒之类的犯罪发生，皖北地方政府不得不动用各种资源，这挤占了经济建设基金，加剧了本来就紧张的地方财政。

4. 落后的生育文化

经济上的贫困，农村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以及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落后性，造成了区域生育文化具有明显的落后性，以多生为追求的目标。这种旧的生育文化观念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皖北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观念仍十分盛行。解振明在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进行了计划生育与妇女地位的调查，发现这两个地区现有孩子男女性别比例都存在着异常现象，但皖北地区(127.9)比苏南地区(112.5)更高。皖北农村妇女想生男孩，除了现实生活的困难外，还有一个出自于精神上的需求，就是提高自己在家庭、在村子里的地位。苏南地区的妇女经济地位明显高于皖北妇女，尽管这里的男女差别仍然存在，但是当地农民在现实生活方面对男孩的需求不像皖北农民那么强烈。这些变化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756-61]

目前，安徽省人口超过100万的16个县有13个县在皖北，落后的生育文化使皖北的人口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将给当地的婚姻状况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恶劣只是贫困基础，文化落后造成的人力资本质量低下才是贫困根源，它禁锢了人们的手脚，使人们丧失人生价值的合理追求，泯灭了改变现状的信心，消磨了战胜贫困的意志，把人们推入一片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

四、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形成

皖北经济、文化变迁最显著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各种自然灾害中，以黄河不断决溢对皖北影响最大。它改变了皖北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再生产条件恶化。另外，皖北地理上处南北之中，又是重要的经济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两淮地势平旷，无大关隘，易攻难守，所以战乱较多。

1. 皖北产业发展与贫困文化的形成

皖北的自然灾害阻碍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商业文明乃至工业文明的兴起。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纺织业是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摇篮。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凡是在封建时代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比较发达、产品商品化程度高的地区,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最早承接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和挑战、并且能尽快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区域。因此,封建时代纺织业越发达的地区,当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越高,抗灾能力越强。

唐以前,皖北地区的纺织业十分发达,亳州宿县的贡绢、寿州的贡丝布、颖州的贡丝棉等在唐朝被列于全国七等级中的一二三等。^{[9]108}自南宋以来,皖北自然灾害频繁,纺织业的发展进程经常被打断。明代棉代替麻成为平民衣被主要材料是经济上一大变革,棉布成为大商帮经营的仅次于粮、盐的第三位商品,棉纺织业的发展水平往往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棉花是深根作物,需要深厚的活土层;耐旱而忌渍涝;轻度耐碱。而频发的自然灾害使皖北许多地区的土壤或沙化或盐碱化,水利条件恶化,已不具备发展棉产业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棉花种植面积和商品化程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家庭纺织业衰退。清朝时期,全国各地区打破了原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完成了粗略的自然分工。沿江沿海地区形成了手工业专业区,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凭借深厚的商业基础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近代产业乃至现代产业的转变。皖北则因为农耕文明的桎梏,日渐破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

2. 皖北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文化的形成

灾害使民力资财遭到巨大损失,大大限制了当地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并能为其带来永久收入的能力,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三种类型: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生存方式选择)。

(1) 灾害制约了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萧一山《清代通史》附有“清代学者著作表”。该表共列 970 人,江苏籍学者 316 人,占 32.58%。在这

316 人中,江南占全省 3/4。江南之中又以苏州府最盛(111 人),其次为常州府(66 人)、扬州府(47 人)。而淮北海州倒数第一(1 人)、徐州倒数第二(3 人)。安徽情况大略相同。在“清代学者著述表”中,籍隶皖省者共 85 人,其中江南徽州府就占了 40 人,而淮北凤阳、颍州、泗州三府州,竟无一人。^{[9]8}

再以科举人才而论。根据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所列“江苏省的进士百分比”统计,科举人才,以江南居多,占 70%,其中又以常州府居多,次为苏州府,占 22%。两者合计,即达 45%。而淮北徐海两府合计,仅占到 1%。^{[10]51}清代安徽进士共 1189 名,江南亦超乎其前,而淮北同样瞠乎其左。如皖北蒙城,“民气强悍,重武轻文,在前清时代百年间无得科第者”。^{[11]62}这种情况,在皖北是极普遍的现象。

人才分布的不平衡性,是与教育发达程度一致的,无论私塾,抑或官学、社学、书院、义学,其发达程度,江南、淮北均不能相提并论。仅以书院数目而论,江南居多,江北次之,淮北又次之。这种情况,与人才分布、各地人文盛衰相契合。

(2) 灾害导致人力资本外流

早在先秦时期,两淮已是封国林立,列国争雄之所。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金时期,两淮多次成为南北政权的交界区,双方在此攻伐不休。同时,皖北还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重要策源地和响应区,除北宋、南宋农民起义在此地影响较小外,其他朝代的农民起义都兴起或波及于本区。战乱使人口减少,生产设施废毁,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停滞或倒退。

除战乱外,自然灾害的发生,政府出于军事和政治、经济目的的强制等,也使皖北屡屡发生移民现象。皖北人民的南徙,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给皖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在某种程度上,外迁人口多为流动性强的“精英”阶层。如官僚、大族、地主、工匠、儒士等,他们是地方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生产的管理者。平民阶层能外迁的也多是身强力壮者,是稀缺的劳动力资源。

总之,战乱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当地的人力资本产生了逆向选择:凡是外徙的,流动性较强,往往承载着先进文化;凡是停留在皖北的,流动性较弱,往往是落后文化的载体。长此以往,落后文化驱逐先进文化,逐渐形成贫困文化。

(3) 皖北主体面对灾害的生存方式选择

主体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下,在应付生存环境的挑战面前,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能力差。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所著《各种族之特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一书里,将中国恋家的、守旧的、动作迟钝的北方人和积极的、前进的、性好冒险的南方人做出比较,把北方人的精神面貌归因于数千年来所发生的饥荒折磨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他着重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解释种族特性,而没有将主体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考虑进去。就一般情形而论,主体拥有的人力资本质量高,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也较强。他们具有较高的智慧,思辨力强,能够对周围环境做出较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能够选择较优的生存方式。江南徽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徽州山多地少,人口膨胀,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徽商崛起,并在明清时代执商界之牛耳。皖北人则不同。他们缺乏的正是这种可贵的创始精神,在环境的挑战面前,他们显得消极、畏缩、软弱无力。20世纪初一位曾到过皖北的美国观察家,作过这样的比较:

(江南)尽管有可怕的涝灾,但人们由于有频年丰收的支撑,灾情一过便虎气生生全力以赴挽回损失、重建家园,很快恢复元气;但淮北、苏北则不然,连年歉收好像上帝所为,于是人们吃掉耕畜,吃光种籽,卖掉土地,用尽钱财,于是在乞讨和行窃之间进行选择,而且选择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可偷抢的东西不多,强有力者始能为。^{[12]166}

这个比较有一定的道理。江南人的“虎气生生”与淮北人的“一蹶不振”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窥见,精神风貌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表现形式,与生存方式的选择即文化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主体人力资本质量较高,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强,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比较容易实现自身的转型。江南农民转为工人,实现向上流动者多多,江南城市化的发展,他们是推波助澜者。而皖北流民要么加入乞丐大军,要么去干江南人不愿干的工作。

当然,皖北素质较高之人也有,绅士即是。但他们在文化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出人意料的。有的不是引导农民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而是组织丐帮,自为首领,使“行乞江湖为业”的生存方式凝固化。^{[13]62}

总之,皖北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质量相对较差,成为皖北社会经济发展、走向近代的牵制力,同时,

也由于人力资本质量差,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差,决定了他们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也是低层次的。

五、皖北地区反贫困文化的措施与途径

目前的文化扶贫的着眼点主要是素质扶贫、教育扶贫,如搞“三下乡”活动,发展普通教育,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等。固然,这种扶贫是十分需要的,它的功能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素质,为脱贫提供智力支持,这比原先实行的单纯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的层次提高了,但它毕竟停留在智力开发层面,而不能触及贫困人口的价值理性与精神世界,不能祛除人们灵魂深处的贫困文化,收效不大。因为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贫困者缺乏一种赋予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和行为方式,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对贫困者抱一种宽容体谅的理解态度,考虑贫困者的实际想法,重铸贫困人口的价值观。

1. 转变生产的观念价值形态。大力培育、开发和发展贫困地区的商品经济市场,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的产业化转型,利用市场,形成广泛竞争激励机制,通过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改造人们的生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大力发展推广科学技术,使贫困户在学科技、用科技中转变生产价值形态。

2. 大力培养、留住本地人才。对当地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居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历能达到大专以上水平,希望他们能跳出去到外地生活。建议安徽省一些高校对皖北地区考生实行定向招生,学生毕业后回原地,相信这些见过“世面”、受过外面世界新生事物的洗礼和冲击的新人们必将给当地传统文化改变带来一股清风。

3. 树立先进榜样,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开展对口扶贫,由政府出面将皖北地区与外面较先进地区搭成对子,组织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到先进地区参观考察,使之开阔眼界,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同时派遣先进地区的干部和科技能人去皖北地区定期指导工作,重点培养一些较易接受新观念、肯吃苦的贫困户率先摆脱旧思想束缚,脱贫致富,以其示范效应,促进和带动其他群众。

4. 转变生活的观念价值形态。移风易俗,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创造健康

文明的新风尚,转变人们的生活价值形态。

5.要进行制度文化的创新。反贫困的重点在农村。当地农村制度的短缺使得好的政策、法规难以贯彻下去,村民的一些想法、点子得不到实践,极大的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技术的停滞不前。而如果广泛推行新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必将再次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 [1]吴海涛.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尚书[M].周秉钧,译.长沙:岳麓书社,2002.
- [3]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9).
- [4]韦明铤.浊世苍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 [5]王振忠.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6]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7]解振明.人们为什么重男轻女?——来自苏南皖北农村的报告[J].人口与经济,1998,(4).
- [8]张研,孙燕京.19世纪中期以前皖北小农家庭的生计——以凤台县为中心[J].中国农史,2003,(3).
- [9]萧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0]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M].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
- [11]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M].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1.
- [12]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3]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高 焕

Culture of Poverty in Northern Anhui and Its Economics Analysis

Wang Yanmin, Chen Nianh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Trade, Bengbu233041, China)

Abstract:The economy in Northern Anhui was flourishing during Far Ancient Period and Middle Ancient Period. However, assailed by the frequent shock of natural disaster for almost a thousand years, the industry now is backward and the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is insufficient. As a result, culture of poverty is deeply rooted,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northern Anhui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northern Anhui.

Key Words: poverty; culture of poverty; economics analysis

·徽州文化小资料·

徽商“四元宝”

《扬州画舫录》载:“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荚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这“四元宝”便是黄晟、黄履暹、黄履灵、黄履昂四兄弟。

黄晟,字东曙,号晓峰。家有“易园”,刻有《太平广记》、《三才图会》诸书。

黄履暹,字仲升,号星宇。曾延请名医叶天士到家中,与王晋之、杨天池、黄瑞云诸人探研医学,开“青芝堂”药铺,刻《圣济录》,又为叶天士刻《叶氏指南》。扬州著名胜地“四桥烟雨”、“水云胜概”便是他的别墅。

黄履灵,字昆华。由刑部官至武汉黄德道。他将北京的官邸捐作歙县会馆,又在歙县梅渡、草墟购田,用以救济族中穷人。

黄履昂,字中荷。家有“别园”。曾出资将扬州木质虹桥改建为石桥。